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民国文献丛刊

胡汉民 著

胡漢民自傳

中華書局

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民国文献丛刊

胡汉民 著

胡汉民自传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汉民自传/胡汉民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1
(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)
ISBN 978-7-101-11178-1

I. 胡… II. 胡… III. 胡汉民(1879~1936)-自传
IV.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86034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胡汉民自传 |
| 著 者 | 胡汉民 |
| 丛 书 名 |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|
| 责任编辑 | 张荣国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920×1250 毫米 1/32
印张 5 $\frac{7}{8}$ 插页 2 字数 12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4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1178-1 |
| 定 价 | 32.00 元 |
-

出版说明

文献史料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基础，民国史研究自不例外。为了给民国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史料利用上的便利，我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合作，推出“民国文献丛刊”。

“民国文献丛刊”首批图书中，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授权，列入了原属“传记文学丛书”和“传记文学丛刊”的一些作品，包括《刘汝明回忆录》、《银河忆往》、《逝者如斯集》、《颜惠庆自传》等十九种。

由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政治立场的影响，一些作品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时代局限和政治色彩，一些个人视角的描述与评论，难免有不符合事实之处，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我们除了作必要的技术处理外，基本保留了作品原貌。希望各

位读者在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，着眼于其文献价值，辨析真伪，而获得本真的历史事实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一四年七月

目 录

胡汉民自传

- 一、家世与少年时代 /1
- 二、前清钳制汉人之政术 /4
- 三、清廷之排外与媚外 /8
- 四、游学日本与退学归国 /13
- 五、就任梧州中学总教习与宣传革命 /15
- 六、再度游学日本与对梁启超之批评 /17
- 七、初见总理与参加同盟会 /21
- 八、编辑《民报》及与保皇党之论战 /26
- 九、对由日退学归国问题之意见 /30
- 一〇、使用青天白日旗之决定 /34

- 一一、随总理赴南洋与亲历镇南关之役 /37
- 一二、策应河口起义 /41
- 一三、黄冈起义之经过 /44
- 一四、对杨度与刘光汉之批评 /47
- 一五、在南洋对保皇党之斗争 /48
- 一六、劝汪兆铭勿行暗杀 /51
- 一七、任南方支部部长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之经过 /53
- 一八、设法营救汪兆铭 /57
- 一九、筹划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 /60
- 二〇、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 /70
- 二一、出师北伐 /79
- 二二、清除粤省反动分子 /82
- 二三、改选广东省会议员与应付英人办法 /83
- 二四、对党人之观感 /85
- 二五、袁世凯之阴谋 /88
- 二六、从总理至沪转宁与襄助组织临时政府 /91
- 二七、在临时政府时期之作风 /99
- 二八、迁就南北和议之真相 /102

二九、同盟会之改组与各省都督之更动 /107

三〇、随同总理游历武汉 /112

三一、复任广东都督 /117

胡汉民先生传（节录）

一、幼年家世 /121

二、从事革命 /122

三、广东都督 /127

四、讨袁护法 /132

五、主持广东政务 /135

六、共党把持赴俄考察 /139

七、出国考察 /143

八、从事著作 /149

九、病卒广州 /149

十、思想与著作 /153

参考资料 /176

胡汉民自传

一、家世与少年时代

余父文照，为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人。累世业农，至祖父宦游来粤。父治刑名，就幕州郡。母文姓，江西望族，能为诗，且解音乐、围棋。余以千八百七十九年出生于广州番禺县。幼即从父母流寓博罗、茂名、德庆等县。父性廉介，其客州郡，稍不合，即拂衣去。生五子二女，食齿繁，故家常贫。母极勤俭。余幼时最见爱于母，既就学，记忆力独强，由是父亦爱

之。幼年事无足述者。惟记于六岁时随父母至高州，途中雇挑夫，给以工资。辄为夫头干没，夫役咸咒骂，夫头方施施然从二烟馆出，各夫见之，复无如何，余甚怪各夫之懦。又七岁时，寓高州府衙，与老仆过衙中审讯处，适刑扑犯人，犯人号呼如豕啼，余急走避，数月不敢出。此二事印象颇深，故稍长亦未尝有叱责婢仆之事。其时太平天国失败，满清为中兴时代，仍以八股科举取士。余十一二岁时，日能诵数千言，遂尽读所谓十三经者，更及史记、古文辞之属。下笔为古文时，文俱斐然可观。一八九一年秋，父病歿，由是无力从师，仅自修于家。一八九三年母复病歿，凡两月始克举殡。家庭生计，盖有不堪言状者。

父教至严，而余则极孝。父患病以误信庸医者言，沉绵数月，余闻长兄进谏而为父所斥，则亦默然退。至父病革，余哀且愤，骤入厨取刀欲斫杀某医，叔父某掩入，夺其刀，举家以为将自杀以殉，母哭尤哀，余亦伏地哭，而某医闻声逃，十年不复见矣。母死以家计故，与长兄清瑞各课徒糊口。兄与余友于最笃，兄治经最

力，余不能也。余年始十六，门徒有十七八岁者。既课徒，复须自修，且时应考书院，博膏伙以贍养弟妹。尔时中国学子皆不识所谓卫生之说，惟夜继日，穷年苦攻。父母见背，而一兄一姊两弟，皆以医养不足，相继殁谢，以是常忧伤憔悴，而壮年体弱多病，俱缘于此。幸而知识欲颇盛，又能为诗，忧愁有所发舒，故不致发生厌世思想。十五六岁从书籍中见顾亭林、王船山诸人著述，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。适有中日之役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使当时学界为之激昂，辄攘臂而谈时务，顾皆无要领，于余心未膺。独孙逸仙博士忽谋革命于广州，则以为空前奇举；然其时实未识孙先生为何如人，且无由与通；惟有间从耶稣教会信徒来往，稍知一二，因孙先生本为教徒。其时耶教乃官府所畏惧，间有秘密出版之书籍，亦由教徒密为输卖，教徒尔时常有同情于反对政府者。如是者十年，其后则反是矣。清廷败于日本，其腐败而无能力之弱点，无从掩蔽，少数较开通之官僚稍欲引进嗜新敢言之士，以与顽固者角胜，其动机亦缘于帝后党派之争。清朝袭用中国从来宗

法社会制度，西太后以女主握政权者二十余年，谓之垂帘听政。至光绪帝载湫既长，名虽归政，而在朝大官大抵为太后所任用。有翁同龢者，为帝师傅，欲拥帝而排斥后党，于是文廷式、康有为辈由是不次进擢。中日之役，以海军年费辄移入内务府为颐和园用（太后所居），为召败之一因，军事当局之李鸿章，亦抗疏言之。后党多老朽，既败于强敌，则亦稍敛，以让所谓维新变法之新进，此一八九六、七、八年政局之情形也。

二、前清钳制汉人之政术

满清本以少数民族宰中夏，盖乘明代内乱而以兵力得之。张献忠、李自成以饥民为流寇，惟事残杀，造成恐怖，明之诸王又皆脆薄，不足与满清抗，清之得中国易于蒙古。顾其钳制汉人之政术，则超出蒙古数等，自握政治中心，权不旁落。稍去明代之严刑苛税，以收民心（如康熙永不加税之类）。奖励儒学，多用汉人为文

学侍从之臣，以平士夫之气。举族皆兵，如斯巴达之于雅典；且分以驻防各省，防止内乱；疆臣分管兵刑钱谷之事，俱受成于中央，故终满清之世，无有以封疆大吏能据地以反者。又大为宣传，其始为君臣大义之说，破古来夷夏之辨，冀以移易汉人民族观念。继则伪造故实，谓满族亦同源于诸夏。收天下藏书著为四库，其对于满清统治有反动者，列为违禁书目，严令摧烧之。康乾之间，文字之狱数见，戮尸夷族，以钳其口。然汉人民族思想，终不消灭，托为神诞，以纪念明亡。如《太阳经》之属，纯为崇祯帝而作，文极俚而普遍。民间死则着前代衣冠以殓，谓之“生降死不降”。明之遗民以文网不可犯，而士夫糜于爵禄，不可与谋，于是创所谓洪门，以反清复明为口号，成一种秘密结社，遍于南北各省，表面则取互相扶助之形式，下层社会争趋之，纪律甚严，刑赏必信。其作始之人，亦知此种会党仅能为革命之材料，与其潜伏之势力，其发动必赖于英雄豪杰之指挥，故洪门又有待真主之言。清康乾间所谓白莲教造反，嘉庆时代林清之反动于北，王三槐等之反动于南，

皆以会党起事，至太平天国则尤其彰明较著者。至满清末叶，重以帝国主义之侵掠，民生日蹙，清廷政治，惟有黑暗腐败，满族尚武之精神已衰，日趋于统治贵族坐致灭亡之末运。于是汉人民族思想日盛，以至于倾覆满洲。一八八八年所谓戊戌（按戊戌应为一八九八年）变法，其内幕为帝后之争。光绪帝引用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之属，杂取所谓西法者，以诏令施行之，其重要者为废科举、开学校，余则纷然无复条理。谭嗣同等号新参政，后党已颇侧目，且其盘据已久，后之妹婿荣禄，方握重兵，颐指内外。于是康有为、谭嗣同等密谋以兵去太后。袁世凯者，初亦与康、谭同为保国会会员，世家子，有干才，自高丽事件失败归，谭嗣同等说帝不次擢用之，袁亦伪与康、谭亲附。旋得掌荣禄所管兵之一部，康、谭乃假帝旨意，使袁以兵入京，便宜行事。袁索帝诏书，康、谭不能应，但谓帝意如此，且事系帝之生命，非此无以救帝于太后之手。袁伪应诺，而即驰往告密于荣禄。荣禄以告太后，遂一日尸谭嗣同等六人于市。康有为幸走免。梁启超方在上海，亦不及难。后仍

听政，乃帝所行新政悉推翻，而袁世凯且日见任于后矣。康有为始为保国会时，犹放言：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；而其后乃专言保皇，结保皇党于海内外，盖历史环境使然。自其对于满清贵族的政治而言，亦为一种反动，而其实则代表新官僚阶级利益而已。其卒不能与革命党抵抗亦以此。

革命、保皇两党之领袖，皆出于广东，此为地理之关系。顾孙先生之谋革命也至秘密，其第一次举事，亦以会党为基本队，而学界无知其事者。康有为生长广州，聚徒讲学二十年，其得志前后，广东学界颇受其影响，惟余则素薄其为人与其学说。盖康居乡，为土豪劣绅之所为，热中奔竞，行不践言；治学则剽窃武断，只以大言欺人。其徒相率效尤，高者当不逮唐之八司马。且是时余之民族思想，已不可遏，康等由保国而变为保皇，其理论尤觉每况愈下，故当时对之，绝对不生一种信仰，康徒每言尊王攘夷，笑应曰：“王者孰谓？谓文王耶？”

三、清廷之排外与媚外

余十九岁后，虽仍以舌耕砚耕为活，然生计已渐裕，交游亦渐广，日与社会接触，而受环境之刺激，益思奋起而改革之。一九〇〇年，史坚如埋炸药轰广东巡抚署，以应孙逸仙先生惠州之师；事不成，遇害。余故识史氏兄弟，且爱坚如之为人；惟是举则未与谋。此役以后，革命实行者俱远适他国，余常独居深念，以为非游学，无以与革命党人谋，即个人学业，亦犹不足充所怀之志愿。乃决心为留学计，然其时个人经济，尚不能达到也。

清末义和团事件，不独影响于清政府本身，且影响于全中国，影响于世界各国，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，亦受其影响。其总原因为排外，为受列强压迫之反动；然其内容颇复杂，其分子有农民、会党与清室亲贵及守旧之官僚，则各以其阶级地位而观点不同。帝国主义之列强侵入中国，以通商、传教为两大工具。通商则打破

中国从来之自然经济，而内地失业落伍者日多；传教又挟有势力以压一切平民，则于信仰之外，更生反动。（耶教人常有怪佛教入中国，不遭排斥，何独异于耶教者，此实自忘其面目。佛教固未尝有如耶教以帝国主义为其背景，作其策援也。故满清末叶排外与仇教，几互为因果，各省闹教之案，几无岁无之，以列强为后援，其结果决无公平之判决，平民积恨已深。）北方各省以交通不便，生计落伍者，自较有通商口岸之省为众。教士挟其公使、主教之势力，而欺人民之无知，则亦愈横。瓜分海港，本为帝国主义列强预定之计划，为继日本割取台湾后之一定步骤；然表面则由山东杀一教士，而德国乃以为报偿及惩罚之条件，而据割胶州；一时旅顺、大连、威海卫、九龙、广州湾等，纷纷丧失。列强更进而设置其所谓势力范围，声明中国某省某省不得割让于他国，如德之于山东；英国之于扬子江各省；法国之于两广、云南；日本之于福建等；俱就其已获得之地域，更延长之，为将来割据之张本。中国人民于是时，既惧且愤，故排外为义和团事件之总动机，为帝国主义压迫之